

马街书会起源浅说 (下)

(接上期)另外,上述资料中特别提到了广严禅寺和《重修广严禅寺碑记》,并以此作为马街书会延续700多年的重要依据,但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马街书会是以河边的火神庙为中心展开的,广严禅寺则位于马街村内,二者相距三里有余。再者,《重修广严禅寺碑记》主要记录了该寺的兴废史,并未言及应河火神庙说书会。若此,清嘉庆二年《宝丰县志·金石志》记载的北齐天统四年(568年)马渡街佛教寺《石造像碑记》距今已有1450余年历史,是否也能作为马街书会之历史呢?可见,以广严禅寺的修建时间来确定火神庙正月十三说书会的起始时间不妥。

查阅了一些古籍资料和历史事件记录,笔者认为,马街书会极有可能源自唐代,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三、马街书会形成的宗教文化背景

(一)庙会的产生。关于庙会,1980年版《辞海》这样解释:“庙会亦称‘庙市’。中国的市集形式之一。唐代已经存在。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故称‘庙会’。《北京风俗类征·市肆》引《妙香室丛话》:‘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这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市集形式,解放后在有些地区仍被利用,对交流城乡物资,满足人民需要,有一定的作用。”庙会的源泉在于远古时期的宗庙社郊制度——祭祀。在远古时期,祭祀是人们生活中一件经常而又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所以《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祭祀过程中,人们聚集在一起开展一些活动,如进献供品、演奏音乐、举行仪式等,这种为祭祀神灵而产生的集会可以看作是后世间庙会的雏形。实际上,从“庙会”二字本身也可以看出这点,“庙”最初就是指供奉神灵尤其是祖先神灵的建筑物。

与其他民俗一样,庙会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能够体现出时代的色彩。秦代,庙会的内容单一而稳定,即祭祀祖先与神灵。东汉末期,道教开始初步形成,庙会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内容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色彩,各种习俗也开始初步形成。《西京杂记》描述了当时的祠庙祭祀习俗:“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醞,太牢”“京师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祷祠如求雨法”。

几乎在同一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佛道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到了唐代,两教均达到了全盛时期,对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出现了诸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后来这些宗教仪式慢慢加入了舞蹈、戏剧、出巡等娱乐内容,不仅吸引了信众,许多凡夫俗子亦多愿意随喜添趣。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着中心位置。道教文化经过帝王们的倡导更加迅速繁盛起来,庙会亦应运而兴。

(二)盛极一时的唐代道官道观建设。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年间,是唐代道教发展的高峰期。当时不仅各州及五岳均建有太清宫和

道观,而且在皇宫内也建有长生殿(亦名“集灵台”),以祀天神。在长安城内的崇玄馆,专门设置了大学士一职,由宰相兼任,统领两京的玄元馆和道教官、观的宗教事务;各州的道教官、观,则由当地的长官或节度使兼领。由此可见唐玄宗对道教的重视程度。

随着道教的社会地位提高和大发展,道官、道观的数目急剧增加,道士和女冠的人数也成倍增长。在唐代前期,公私新建和改建的道官、道观很多。据《唐会要》卷五十《观》篇记载,在西京长安著名的宫、观有:太清宫、龙兴观、昊天观、东明观、弘道观、太清观、兴龙观、景龙观、福唐观、金仙观、玉真观、仪坤观、都玄观、安国观、玄都观、三洞观、清虚观、天长观、崇真观、兴唐观、昭成观、九华观、玉芝观、新昌观、华封观、玄真观、福祥观和奉天官等28处。这些宫、观,或由朝廷兴建,或由王府、公主故宅、大臣故宅改建,规模都很宏大,建筑多为宫殿式。在东京,著名的宫、观有太微宫(本玄宗皇帝庙)。在登封县嵩山,有隆唐观、嵩阳观(以北魏所建嵩阳寺改)、太乙观,规模也很大。除太微宫为宫殿式外,其余略同于佛寺。泰山、华山、恒山、衡山、嵩山五岳,各有真君祠,各州都建有紫极宫,以及大、小道观。这些宫、观规模都比较小。另外,当时不仅有道士的道官、道观,而且有女冠的道观,如西京的太平观、太清观、金仙观、玉真观、都玄观、安国观、昭成观、新昌观、华封观,都是女冠观;而奉天官(在河南府登封县城道士观)、金阙亭(在长安女冠观),是专门度皇族和皇后妃官女的。

高宗弘道元年(683),规定上州官府建观3座,中州2座,下州1座,至玄宗,道观建筑基本没有限制。据《唐六典·祠部》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宫、观1687所。马街应河岸边的火神庙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三)唐代道教乐舞对说唱音乐的深刻影响。唐代是宫廷音乐和道教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面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统治者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促进了民族音乐的大融合,道教音乐走进皇宫,与宫廷音乐巧妙结合,音乐风格呈现多元化。南京艺术学院传媒舞蹈学院副教授张素琴,在《唐代宫廷乐舞〈上元乐〉中的道教元素》中说:唐代是中国古代宫廷乐舞的高峰时期,不仅具有完整的雅乐祭祀乐舞,而且构建了完备的燕乐体系,其乐舞构建接纳和借鉴了大量的佛道文化因素,如《菩萨蛮》《上元乐》《紫极舞》等。据新旧唐书等典籍记载,唐皇室以道改乐和因道创乐(舞)的历史有数次,在玄宗时期达到高潮。一方面将已有的宫廷乐舞改为道调或延请道士创作道教乐舞,另一方面将各乐舞类型进行融合,如开元二十四年,“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新唐书》卷22《礼乐志》)等,成为独特的乐舞文化现象。

以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为代表的皇家士族,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了老子,因而以老子所在的“李”姓士族阶层的社会、文化地位以及老子所代表的中华文明正统思想——道家思想为根基,奠定了唐朝皇家士族统治地位

与大唐帝国盛世的根基。他们自认是老子李聃后裔,尊老子为国祖,将道教定为国教,道家学派的思想处于被尊崇和核心的地位。皇宫的乐工们制作了大量所谓的道调,即一般意义的富有道教神仙色彩的道曲。《新唐书》卷21《礼乐志》记:“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皇宫内专门有人收集和整理道教经籍,唐玄宗时编撰了第一本道藏《开元道藏》。

为了体现李唐统治的神圣化,统治者在全国大规模建立道观,以致全国上下官观林立、信徒众多,为道教音乐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四节《道教的流行》中说:唐高祖李渊认道教宗李耳为始祖,尊道教为国教,以道教“清静无为,无为而治”为治国纲领。唐太宗李世民637年下诏,男女道士位高于僧尼之上;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大兴道教,教人画老子像分送全国道观庙宇。这样大规模地提高道教地位,促使全国道教庙观林立,男女道徒大量增加。

这种独特的环境,促进了道观里的变文讲唱——我国说唱音乐始祖的正式形成,这种变文讲唱在很多记载中称为“俗讲”。变文的文体是韵散间用的长篇叙事体,韵文部分以七言为主,杂以“三、三”句式或五言等。这种文体与诗不同,它的文字通俗,平仄不严,用韵较宽,散文部分为通俗的白话。这些特点都为后世的弹词、宝卷和鼓词等形式所继承。变文的实地说唱情景,在唐代赵璘的《因话录·卷四》中有载。变文讲唱的内容,有道教故事,有民间传说,还有历史故事,如《舜子至孝变文》《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唐代的说唱音乐除了变文讲唱以外,还有民间的说书,这些只流行于民间的说唱形式,如有的艺人说《一枝花》,还有的说《三国》故事等。到了宋代说唱音乐已趋于成熟,元明时期继续发展,至清代达到空前兴盛,成为遍及全国有数百个曲种的形式。

四、唐代道教说唱文化成就了名扬天下的马街书会

1988年河南省曲协任骋和张凌怡在宝丰马街调研时,采访了郑县著名说书艺人王树德(艺名叫王结子)。王树德讲,唐朝时期佛、道两教同处共生,朝廷到处建庙宇。由于自古就有民众祈福还愿的习俗,人们若遇病、灾等难处,都会去庙宇烧香许愿、还愿,还愿时会请来艺人根据许愿内容说唱“愿书”。马街书会即因此而起。

有这样一个故事:

书会东侧的新寨村原名“新农村”,俗称“新寨”,兴建于民国十九年(1930)。寨南门内的东栏马墙边曾住着一户姓人家,户主姬保堂,原籍张八桥镇西火山村,生于1920年。姬保堂十三岁那年乞讨至应河火神庙,被老道收留,后在新寨成家落户。

在火神庙生活的十余年里,姬保堂听老道讲了许多道教故事,其中包括火神庙和庙会的往事。据说火神庙原先叫通仙观,属于

皇家祠庙。现在火神庙北边一畛地(今中华曲艺展览馆)那两大堆砖头、石块、瓦砾就是通仙观遗迹。这两堆东西自古就存在于新寨村西300米处田地中央,只因相传是神庙的东西,始终没人敢动。直到2013年、2016年县里建曲艺馆和曲艺交易中心大楼时才分两次移走。

据说,通仙观里供奉着老子圣像和火神祝融,有百名道士,教习道经、道韵、歌舞等。这一年秋冬季节,龙兴县唐县令来到通仙观传朝廷诏谕:洛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州县都要派遣演唱团队到洛阳汇演。道长挑选30名精明而有学识、通晓韵的道士,用南方道韵谱曲元结所作《补乐歌十章》,以长箫、横笛伴奏,加紧排练。正月十三那天,道士们头戴黄冠帽,身穿道袍,足蹬云履,手抱渔鼓,用十支横笛、长箫伴奏,渔鼓击节,边唱边舞,赢得满堂彩,受到唐王褒奖并御赐手书匾额“发扬光大”。此事发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自此之后,各地庙观派遣道教弟子,到火神庙拜师学唱道曲。那些出师的道士每年都要带着徒弟前来归宗拜师。因为是正月十三受唐王封赏,这一日也就成为唱曲道士的朝圣之日。来的人多了,就各自在庙外的田地东一聚西一伙地说唱起道情、弹词、三弦、大鼓等,南腔北调,五花八门。远近村民也会来听戏,渐渐就有了庙会。

史书记载的有关史实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故事:

《新唐书·元德秀传》载:“玄宗在东都,黜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是市颇言且第胜负,加赏黜。”另据明万历《汝州志·官师志》:唐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母亡庐墓。天宝中为鲁山令。……玄宗在东都,命三百里内守令各以声乐集,德秀惟乐工数十联袂歌芋葛,帝叹曰:贤人之言哉……”

《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高宗“调露二年(680)幸洛阳城南楼宴群臣,高宗自以李氏老子之后也。于是,命乐工制道调。”该书第十二又载:“帝喜神仙之事,诏道士司马承贞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会元制《大罗天曲》;工部侍郎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太清宫成,太常卿韦绚制《景云》《九真》《紫极》《长寿》《承天》《顺天》六乐曲;又制《商调》,君臣相遇乐曲。”可见,唐玄宗时期道教歌舞已经发展到高峰。

马街书会真正的起源究竟如何,有待历史学家和相关学者进行深入考证。但正月十三的应河火神庙,自唐宋以来延续千年经久不衰,仅靠某一说书艺人和几个门徒是难以实现的。她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依托了唐王朝尊儒崇道、儒道融合的文化基础。同时,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历史,也为庙会说唱文化打下了牢固根基,形成了艺人们崇圣拜祖意识和传统习俗,无论有庙无庙、有神无神,他们都能以崇敬的心态,年复一年地朝着这块神奇的艺术圣地涌来。(完)

本文作者:韩志强,系宝丰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传统文化爱好者。

编后

马街书会是中国民间曲艺界的盛会,是“中国十大民俗”之一,国家第一批非遗项目。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关于马街书会的形成众说纷纭。究竟哪种更接近真实,需要不断的探讨和研究。求同存异,追根溯源,还原历史,是我们文化学者的责任和义务,其根本目的是让优秀的中华文化得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助力我县“文旅强县”建设。同时也诚邀各界人士对宝丰优秀文化进行挖掘著文,讲好宝丰故事。



刘兰芳在马街书会表演 资料图



小艺人在马街书会表演 资料图